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第3辑



YZLI0890122198

*Marxism
and China*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rxism
and China*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第3辑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YZLI08901221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3辑/岳川夫,沈济时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454-9

I. ①马… II. ①岳…②沈…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发展—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3488号

组稿编辑 齐书深
责任编辑 黄玉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3辑)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379,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454-9/A·87

定价 46.00元

目录

论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 岳川夫: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建党 90 周年有感 / 3
- 何益忠:试论抗战前党对党团关系的制度探索 / 14
- 党 为:1921 年以前马克思学说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兼及中国的转译 / 25
- 李苏琳: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份转型的路径探析 / 41
- 张 静: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观 / 48
- 顾 哲:建党前“南陈北李”的马克思主义观 / 54
- 王昌恩:中共早期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国内农民阶级的分析的研究 / 62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沈济时:邓小平关于党政关系的探索及启示 / 71
- 陈代波:到底是谁在伤害司法公信——从云南省高院遭遇网络暴力说起 / 82
- 张建忠: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三者之关系新探 / 91
- 陈 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思考 / 98
- 喻包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稳定功能探析 / 109
- 胡志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119
- 李宏昀:从“类存在物”说起——解读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存论境域 / 13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 胡克培:高校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及其思考 / 145
- 李 婧:刍议讨论式教学法在“基础”课教学中的适用与反思 / 157
- 万勇华:高校“思政”课中音乐教育德育功能的实现方式探析——以“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 166

刘招成:谈讨论式教学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作用 / 177

沈济时 赵庆寺:我校青年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养探索 / 187

贺小石:浅谈网络道德失范现象 / 19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徐家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目标确立的特点与策略——以《邓小平文选》等党的重要文献为依据 / 205

赵庆寺:中国能源安全形势与战略选择 / 215

刘颖涟: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考察 / 224

易 欣: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问题研究 / 239

许 峰:论城市公用事业的政府规制创新——亲贫规制 / 247

冯晓淑:民主法治建设条件下的为人民服务 / 257

夏梦颖: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 / 267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马 川:论对话自我的意义整合 / 275

周嘉楠: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转化研究 / 286

崔文霞:美国高校学生领导力培养的三种模式探究与经验借鉴 / 296

李 洁:“普相女”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 303

童毅影:运用红色资源育人过程中的情感机制 / 309

都晓琴:大学生心理疏导的情感功能 / 320

谭丽君:是拦路虎,还是新契机?——网络时代的青少年德育工作分析 / 326

哲学研究

陈庆权:论美的内涵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 335

王建龙:“治道”与“变道”的分裂——论严复对传统“治道”的反思 /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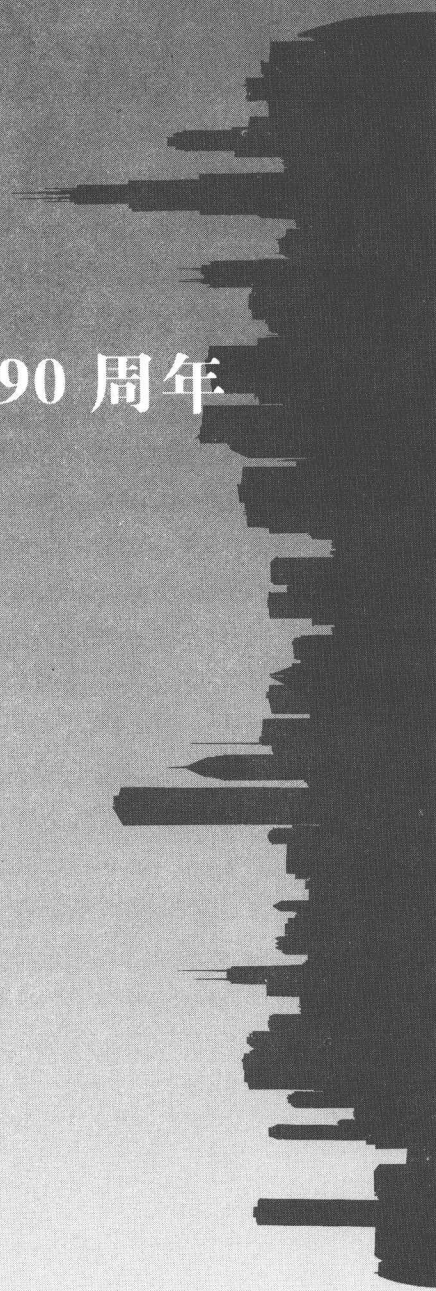
张 秀: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对物权正当性的考量 / 353

吕 娟:试论尼采的艺术化生命哲学——读尼采自传《瞧!这个人》 / 36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论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建党 90 周年有感

岳川夫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全国上下人民群众都在以唱红歌、讲革命故事、理论探索等多种形式庆祝党的生日。中共中央 7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90 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9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今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 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回顾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奋斗历程,或者说,回忆中国近代史这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 90 年,人们是感慨万千,深知其中不易。但是,就对 90 年历程的评价,在理论学术界和社会上是说法不一的,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理论思维的前提

自古以来,人们在回忆与评价前人的事业与社会历程,包括对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总是存在着各种看法与观点,这实属正常,毕竟评价都属于人们的主观思想与精神活动的范畴。这里就涉及评价人的立场、观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 页。

点与方法问题。人们是用科学的态度与客观的、历史的方法,还是凭主观任意想象与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评价?在哲学思维方法层面上,是用历史的方法,还是逻辑的方法,还是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方法问题?

什么是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什么是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方法?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辩证思维中,历史的范畴依据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客观实在(自然界和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指作为对客观实在反映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科学史、哲学史、语言发展史等);而逻辑的范畴是指这些历史的过程通过逻辑的方法在概念等思维形式中的概括,是历史的东西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唯物辩证法认为,历史的与逻辑的方法是辩证的统一。其一,历史的与逻辑的是一致的,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则是历史的东西在思维中的反映与再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因此,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其二,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而是包含差异和对立的。历史的东西总是包含有偶然因素、次要因素以及迂回曲折的细节,具体而生动。逻辑的东西则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②人们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加工改造,抛弃历史细节、抓住主流,抛弃偶然性、抓住必然性,抛弃偏差、抓住基本方向和基本线索,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人们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

二、历史进程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90年的奋斗历程一般分成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即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30年历程如何评价?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与倾向,对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持否定态度。

^{①②} 《马克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切都是“革命”惹的“祸”,假如不爆发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孙中山不领导资产阶级进行辛亥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不成立,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要改写,中国的近代社会历程将不会这样。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革命运动”都是多余的,这些“革命运动”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而是破坏、阻碍了历史的进程,这些“革命运动”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人把中国与英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他们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向封建王朝妥协,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变法,从而这些国家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中国近代假如不进行“革命”,也走上“君主立宪制”道路,那才是中国近代社会理想的选择。

在笔者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就主观的、逻辑的东西(方法)而言,而不是历史的东西(方法),没有用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看待中国近代史,那么历史的东西又是怎样的呢?

有一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最悠久,也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最完备,即封建势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虽然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进行“戊戌变法”、实行改良,因袁世凯的叛变而失败,但笔者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袁世凯的“出卖”,根本原因还是封建势力的强大,资产阶级力量太弱小,弱小的进步势力是不可能战胜当时的封建势力。晚清政府也曾经派学子到英国学习宪政,留学归国后,这些学子一度也曾想改革,走“宪政”道路。结果,还未正式改革,清朝的“八旗”富贵上层特权阶层与权势就极力反对,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是其一。其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国家日益贫弱,战争不断,民族灾难深重,百姓饥寒交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不“革命”行吗?马克思主义人为“社会革命”的出现,并不是任何人主观想要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从现象看,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从本质上分析那都是必然的,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物。“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

时代就到来了。”^①其三,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当年鲜明地确定了奋斗目标,制定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经过近30年的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在古老的东方谱写了辉煌壮丽的史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集中奋斗、推进和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再回顾第二个30年,即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的“第二件大事”。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30年,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9年到1956年。在此期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制度改革,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上称之为“三大改造”。“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最终消灭了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阶段,自1957年至1965年。在这一时期,由于“左”的思想不断抬头,阶级斗争扩大化,相继发生了“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误比较多。第三阶段,自1966年至1977年,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教训更是深刻。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上历史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已作了客观的总结与评价,但是笔者认为,有两条最基本的是可以总结的。第一条,人类追求美好的理想与公平的社会制度,没有社会物质条件是不能实现的。人类自古就有古希腊大哲人柏拉图所写的《理想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的“大同世界”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某些“理想”以及实施的某些政策,例如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等级区别的制度,都是美好的。但是,这些仅仅是“美好”而已,只是人们主观的“应然”而已,也只是“逻辑”的东西。“应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能代替“现实”，逻辑的东西不能代替历史的东西和客观的现实。第二条，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能完成他所处时期的历史任务，但要真正完成新的历史时代的任务，就会遇到困难，或者说，完成历史任务更艰难。原因在于，他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时就成为他的负担和包袱。他自身形成的思维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自我超越。

社会中有些人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这 30 年的失误予以简单的批判否定，笔者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有害而无益，不利于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与总结。

三、现实社会的分析

就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程进行评价，强调历史主义与科学方法，是对当今现实社会的认识与分析，同样也存在一个历史主义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的问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1979 年以来，中国的 GDP 增长了 18 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综合实力已上升至世界第二，中国在 2009 年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各国在中国的投资已超过 8 000 多亿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 50% 左右。10 多年前，美国的某些人士包括一些国外媒体，大肆渲染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提出所谓“中国崩溃论”，时隔 10 年后的今天，2010 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席是中国的银行。中国高铁的技术与速度已成为世界第一，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此为例，激励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世界第一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2008 年夏天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 2008 年 9 月 10 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得来的。西方对中国的赞美不

止来自他一人。我国的这些成就与变化,我们称之为“和平崛起”,而西方称之为“中国模式”。

我们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腐败问题严重,社会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非常大,基尼系数达到 0.45—0.47,自然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令人担忧,更有甚者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中国教育公平问题,老百姓的民生福利、社会保障问题也广受关注。另外,我国的房价如此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社会上流传“蜗居”、“裸婚”之说……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是人们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议论甚至埋怨最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理性地、冷静地分析思考这些社会矛盾与问题,应该看到,一部分是我们在某些决策上的失误造成的,例如,改革开放后,我们从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完全由政府包下来的情况,一下子全部放开,全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而某些地方政府在这些公共事务方面不作为,公房完全私卖,公共租赁房建设滞后,社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能适应人们生活需要……而有些社会矛盾与问题是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就拿人们意见最大的腐败问题来说,这确实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此问题不解决,按照陈云的话讲,要亡党亡国。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腐败迅速滋生也曾经非常严重,19 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在独立后的一个时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十分猖獗,私人雇佣“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存在大规模的官商勾结……目前,社会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存在此类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曾这样说过,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败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亨廷顿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方面说,惩治腐败是非常坚决的,也决不手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瑞金、延安革命根据地就惩治过谢步升、左祥云、肖玉璧等多名腐败的党的领导干部与军队高级指挥员。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初期,又惩治过天津地委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从而影响全国。改革开放的 30 年内被惩治的省、部级党的领导干部就更多,但离老百姓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又如,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比过去要扩大得多,这也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



题,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贫苦地区、贫困人口在缩小。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0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中国人总体上的日子比过去好了,包括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有改善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再如,环境保护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也不要过分悲观。近代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严重。1852年,英国的伦敦在一周内曾发生过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件,欧洲的莱茵河也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但欧洲经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现在是世界环保的先进地域。中国这几年,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环保工作,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环境污染大有改观,中国在节能排污,利用自然能源、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领域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未来发展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今后历程的30年又会是怎样的?这既是我们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思考,一个未来可能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现实或者困惑我们的问题。目前在社会上,有些人甚至党内的某些领导干部对中国发展的未来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能力持怀疑态度并缺乏信心。

这里同样涉及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问题。社会过去的发展、变化的进程可以说是历史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未来的还不是现实,还是个未知数,我们又如何理解“历史的”?历史的进程总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对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或者历史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目标的追求,有一个历史趋势的把握,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能力把中国建设得更好。这不是主观任意的猜测,而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的。理由在于:其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总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总是前进的,所以说“前途总是光明的”。否则,人们追求理想与目标就毫无意义与价值;其二,历史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这两大基本规律作用的结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逻辑的”方法,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科学点之上的;其三,人们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后创立社会科学理论,依照规律去确立自己的理想、目标,这个理想、目标不是“莫须

有”，也不是“乌托邦”；其四，认识规律有了科学理论，形成理想、目标，然而发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能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进行社会实践、去做，那么，梦想会成真，理想会成为现实。这就是历史辩证法，这就是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的客观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进程也证明了共产党人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与心愿能成为现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又一次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后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与目标，还提出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中国人民的智慧，经过努力，第一步、第二步都已经实现了。笔者坚信，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人类社会在社会形态上一般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由于历史条件与自身原因，各地区与国家社会发展形态还是有其特殊性及其差异，但从经济形态上说，人类社会一般会经历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知识经济等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那些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自然经济、农业经济的历史时代，而工业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西方学者把西方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应该说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西方经济发展相对都比较缓慢，有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基本停滞不前，这不是西方人不努力，也不是西方人没有智慧与能力，而是“历史的”东西决定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是历史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特征决定的。而中国刚刚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的工业、市场问题很多，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工业、市场是最有“活力”的，因为它“年轻”，“年轻”才有“激情”，才会蒸蒸日上，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想这就是西方的有识之士看好中国未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需要建立起来，又经过共产党人90年的奋斗、进取、创新，使中国走到了今



天这一步,回顾这一段历史,经历曲折。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在野党”还是“执政党”的阶段,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对过去的错误能够认识并不断纠正。在目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又要求全党同志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党中央提醒全党同志在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历史进程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加紧迫;党中央还特别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人有这样清醒的头脑,是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去完成历史使命的。

第三,积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经验。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并不太长,由于中国人创新的实践,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西方人把此模式称为“中国模式”。西方人包括国内的学者,对“中国模式”解读各不相同,描述不一,甚至对于“中国模式”的定义,国内学者还是颇有争议。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主要特点及其成功经验,大家还是基本认同的。具体说来主要有六个方面:

其一,实践理性。也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思想与科学精神,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与本本主义,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其二,强势政府。中国是一个东方古代文明国家,在古代自然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农业社会与自然灾害的矛盾与抗衡,中国古人面对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就特别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强势政府,靠单个的个体是不可能去抗灾的,只有在强势的政治体制与权力机构统一组织下才能去抗灾。这种体制虽然会产生专制、强权的不利因素,但它的去战胜自然灾害的强大组织能力与力量又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强势政府的观念

与组织结构延续至今。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政府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威、信息、资源去组织经济,去扶植企业,社会上有人称之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西方有政府干预、组织经济的能力,但西方政府这种干预、组织的能力与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其三,渐进改革。我国较好地处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也吸取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三大改造”中激进的倾向到后来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冒进的历史教训,深刻体会到“欲速则不达”的哲理。在改革中采取先易后难,改革不要求一步到位,从农村到城市,先搞特区,取得经验,再从东部到西部,逐步推广。先进行经济领域改革,再逐步推向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其他领域,做到“改而不乱”,“有破有立”,没有“立”之前,不马上“破”,如果社会各领域“只破不立”,出现“真空”,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之一。

其四,民生为大。中国古代一直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民为贵”的思想与传统。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是判断一个政府好与坏的重要标准。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验在于,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做历届政府的根本工作去做。特别是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主要领导人的新一届政府,更是重视这一项工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此理论引领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提出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协调好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展。强调以保障和改造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要求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使全体人民能够真正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

其五,混合经济。我国改革开放后,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也被经济学家称为一种“混合经济”。在经济体制上,加强了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混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是公有制为主体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在经济分配上,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四大生产要素混合共同发挥作用。这些都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性与劳动生产率,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六,我国自 1978 年以来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即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

